

# 《亲历者说“引爆原子弹”》导言

侯艺兵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100088)

(一)

1964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拔地而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现场准备工作全面展开。5058名参试人员来自解放军总部、各军兵种、新疆、兰州军区、二机部、公安部、国防部十院、军事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等26个单位，他们怀着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豪情壮志，搭起帐篷，连营千里，誓夺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二机部九院派出222人的第九作业队奔赴试验现场。他们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押运原子弹元器件，在“596”铁塔下面装配原子弹，再把原子弹送上铁塔安装、测试、保温、直至插雷管，最后完成点火引爆任务。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新疆罗布泊成功地引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九院人在试验场区最核心的部位，围绕着“596”铁塔上的核装置奋战了三个多月，他们亲自引爆原子弹，更亲眼目睹了波澜壮阔的核爆炸场景。这些核试验的点火者、见证者，40多年来一直严守秘密。如今，他们第一次集体向外界披露核爆炸的有关细节，详细叙述了48年前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悠悠往事，成为九院人第一本集体

口述著作。

随着时光的流逝，参加过第一次核试验的亲历者年龄也越来越大，老一辈领导者如张爱萍、李觉、张蕴钰、张震寰已经去世；科学家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等也先后离开了我们。还健在的刘杰、刘西尧、程开甲已年近百岁；周光召、陈能宽等为病所困，无法接受采访。所以，对我来说就有了一种压力和紧迫感。为了抢下更多的鲜活资料，为了录下更详实的口述文献，为了揭开那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也为了澄清一些不真实的误传。从2009年4月开始，我慢慢摸索着学做口述历史，镜头和文字相辅相成。其间甘苦自知，有收获、有沮丧！几年下来，终于学会掌握一种新的采访方式。

由于受到长期的保密教育，很多亲历者要么闭口不谈，要么需出示单位的证明，这给采访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经过近一年的外围采访，我才渐渐地接近引爆原子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核心。说来也巧，那还是由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引起的。

2009年7月，我正在做朱建士院士的口述，他拿出了一张老照片，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爆炸的铁塔上，八位同志紧挨着核装置

一起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10月的某一天。幸运的是，照片上的八位同志有七位健在，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随后，我便找到照片上的人，努力说服做他们的口述。很快，由这张照片引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段辉煌无比的历史。最后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完成一部电视专题片《亲历者说“596”铁塔的故事》。2010年元月，我又陪同中央电视台科技频道的编导，重新采访这张照片上的人和事，参与制作了一部《塔上塔下那些事儿》口述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科技人生栏目》播映。节目播出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他的老家陕西户县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得知他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特意发来贺电，称他是家乡人的骄傲。

按理说，电视片拍了，中央台播了，这件事本可以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我心里一直觉得，由于电视镜头始终没有脱离那张历史照片，采访的人限定在八个人的范围内。讲述的内容局限在铁塔上最后几天，必然留下了很多遗憾。照片上的八个人仅仅是一个作业分队的代表，无法涵盖整个第九作业队

的工作，更不能用以全面描述引爆原子弹的过程。于是，我没有停下采访脚步，手上的名单继续扩大、口述内容也继续往细节延伸。我开始寻找那些直接参与第一颗原子弹的运输、保卫、装配、吊装、安放、保温、插雷管直至到引爆核武器的九院人。围绕着“596”铁塔，围绕着第一次核试验，不断增加采访亲历者，不断找到新的佐证，不断充实丰富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 （二）

据《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记载，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参试人员总共是 5058 人，这其中包含九院派出的参试人员。采访过程中，第九作业队的受访者有的说上去 200 多人，有的说 208 人，到底是多少人？众说纷纭，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的数字。毕竟过去了快五十年，搞不清楚作业队的具体人数一直是我的心结！一直到了 2011 年年底，我终于有机会查找档案。在翻到朱光亚撰写的《参加首次核试验工作总结》一文当中，第九作业队 222 位参试人员的数字跳入眼帘，让长久的困惑顿时化为乌有。更加令人惊喜的是，总结中还有第九作业队各个分队代号及分队负责人的名单。这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已经完成的 28 位受访者中间，许多人恰好是各个分队的负责人，他们既是领导者，也是具体完成试验任务的执行者，所负责的工作基本囊括了核试验的各个环节。后来，我又补充了两位老同志，重点谈原

子弹的押运和作业队组织管理工作，最后变成现在的 30 位受访者。

这里，我不得不说到陈云尧同志，感谢他从浩瀚如海的原始档案中整理摘录下这些重要文献，让我这个查阅者“得来全不费工夫”！别人付出辛勤的劳动，我则顺手摘了“桃子”！在感激、兴奋之余，我还要说，这份第九作业队各分队负责人名单里面，已经有近十位老人去世，无法留下他们的声音和笑容，让人不胜唏嘘！不过，这反而更增强了我把口述整理出来的紧迫感，期盼尽快出版。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受访者群体，本书选出的 30 位亲历者都是原子弹巨响的见证人。他们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正值年富力强，很多人是作为科研技术骨干从全国抽调到九院来的。他们的口述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渲染拔高。尽管当时个人所处的岗位不同，负责的工作各异，讲述同一历史事件时确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受访者用极其朴素的语言，不经意之中给我们展示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他们参加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时，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小心翼翼地完成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从原子弹押运到原子弹装配，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是反复演练，真正做到一丝不苟。甚至拧螺丝钉的动作，拧上几圈都要烂熟于心。在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下，整个核

试验过程中没有出现一点纰漏。面对采访者的提问，受访者说的似乎都是试验现场的工作细节和生活琐事，没有多少戏剧性故事，更缺乏豪言壮语。叙述者说得越平淡，越值得读者细细地品味。因为那些现场的细节，是经过一生的过滤沉淀还能留下来的记忆！那个年代，人人都铆足了劲干活，庄严的工作，铁一般的纪律、政治上的压力是残酷的现实。九院人富于理想，严守纪律，重视国家和集体荣誉远远胜过个人名利和待遇。正如受访者张振忠老人说的那样，“责任胜于能力，有了责任，没有能力可以提升能力，没有目标可以创造目标”！

### （三）

我虽然在采访中拍摄下了这些大多年近八旬老人的照片，但在最后整理编辑时，我没有选用他们的近照，而是刻意选择了老照片，选择 20 世纪 60 年代参加工作时风华正茂的年轻照片。我想，受访者讲述的是 20 世纪核试验，照片的年龄也要尽量与那个时代相吻合。遗憾的是，受当时保密制度的限制，一旦进入了二机部或其他军工系统就不能随便拍照。所以，受访者几乎没有现场工作照片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一个历史重大事件，不同人的回忆能呈现出事件的多样性和多视角，给采访者有许多新的启发，这些启发又不断地修正对该书编辑的认知。面对着七十个小时的录音和一大堆口述材料，我曾经计划把



《亲历者说“引爆原子弹”》一书由侯艺兵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定价64元

每一个人的口述按照采访日期、采访内容包括提问、对话，从头到尾地原文刊出。但是，这显然是一个偷懒的办法。最后我决定把这些口述资料打乱，重组，按照第一颗原子弹出厂、进入核试验场区的时间顺序；九院先遣队到第九作业队大部队进入试验场区直至最后撤离；按照核试验准备程序，从装配到点火引爆，分成若干个小标题，再把不同人的口述穿插其中，努力勾勒出一条从试验前准备到成功引爆的清晰脉络，以便符合一般人的阅读习惯。这样一来，编辑就需要花费

大量的功夫和时间。许多个深夜，我坐在电脑前，头戴耳机聆听着不同方言口音，阅读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同时也被自己不断地发现时而惊喜，时而嗟愕。

应该承认，在新疆罗布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现场的参试人员，多数人不知道北京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决策过程，即便在试验现场指挥的将军、科学家们也要听从“中央专委”的具体部署。所以，我又翻阅了大量传记、回忆录，整理出作为本书主题事件背景的“大事记”。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指挥运筹

帷幄，与奋战在“596”铁塔上九院人的工作身影形成对照，互相映衬。从北京到新疆，从决策到试验，从前沿到二线，浑然一体，让读者从更大的视角来看待48年前的这一壮举。

时至今日，反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段历史，已经有很多报道和出版物，包括传记、回忆录、纪实文学、揭秘等书籍洋洋洒洒地有十几本之多。唯独没有核武器研制单位的人发出声音？有些作品、有些出版物依然带着作者的想象。也许，我们需要一本原始的没有任何修饰的当事人的回忆，用他们自己的亲历，自己的讲述来还原那一段历史。“纪实”也好、“揭秘”也罢，都无法替代亲历者声情并茂地讲述，无法替代见证者发至内心的激情迸涌，这是积蓄多年的情感释放和吐露。因为，经历那一刻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感受，比任何加工修饰过的文字更能打动人，或者说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 作者简介

侯艺兵，祖籍河南，1955年生于云南，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编审。主要从事摄影创作和采访编辑，出版有《院士风采》、《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纪学人》等十多部大型影集。口述史著作有《亲历者说“引爆原子弹”》。曾获第十、十三届中国图书奖。